

刁绍华译

村中三日

列·托尔斯泰散文集



出版社

IE12.64
T953

村中三日

——列·托尔斯泰散文集

列·托尔斯泰 著 刁绍华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中三日:列·托尔斯泰散文集/(俄)列·托尔斯泰著;刁绍华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074-3

I. 村… II. ①列… ②刁… III. 散文-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I51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2882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王越男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马 芳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陶雪华

责任校对 王 玲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6.375

字数 150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10,000 册

定价 7.60 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生也逢辰，问世之时，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出大步，书业也连带繁荣兴盛，因此初印销数不俗，令人高兴。但也可说生不逢辰：因为某些媚俗的销售方式时下日益成为出版行业的时髦操作手段，走进书市，“爆”、“炒”之声不停，大违筹议这一《文库》时的行销氛围。在这情况下，像《新世纪万有文库》这类图书，究竟应该如何进入市场，迎迓读者，颇劳心神。在这时刻，有明眼人忽然援引马克思名言：“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而将永远存在……”，以为书业箴诫。我们读之大喜，铭诵再三，并据以拈出十二大字：“不求显赫一时，但愿传诸久远”，成为我们据以继续行进的座右之铭。也因此使我们坚定信心，决心朝这方向不断前进——即使可能出现某种挫折。

既然“传诸久远”成为我们的基本方针，自然需要我们在选题、编纂、排校等运作上更费心力。第一辑出书后，反应大抵可以，但是批评意见仍然不少。当年《万有文库》定价低廉，我们可说是大体继承下来了；据说当时的某些图书校讎未精，为时人诟病，我们力求避免，但是错谬之处还是可能出现；至于选题，入选之书虽然大多系经名家指点、高手操作，但就总体看，有些不免失诸凌乱（尤以外国文化书系为甚）。凡此种种，我们都认真听取批评，并在调整、改进之中。选题体系严谨，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就译作而言，因为版权关系，不免为难。就第二辑看，此病仍难消除。不过，当今的丛书，似乎追求系统、完整过多，有时不免因此影响质量。我们想学习巴老等前辈当年创办

《文化生活译丛》的办法，以质为尚，体例为次。自然不可“投在篮里就是菜”，但是凡是可食的优质营养品，略加搭配，不论次第，纳入“篮”中，而不计较是否可以由此烧出一台完整的“满汉全席”。此种意义上的“菜篮子工程”，读者其许我乎？！

《新世纪万有文库》之能问世，得力于各位前辈学人、专家学者的指点。我们曾将有关各位大名，弁诸每册卷首，作为永久纪念。本辑开始，不再印出各位大名，而只是藏诸内心。把书编好、出好，为读者服务得更好，即是我们对各位贤硕的最好纪念和感谢！

一九九八年二月

无情的揭发,愤怒的抗议

——译者前言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的创作是十九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高峰,“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第一流的位子”,是“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出的一步”。他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1863—1869)、《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和《复活》(1889—1899)早已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这位大师的文学遗产异常丰富,他的创作体裁多样,并不局限于小说和剧本,而且也有各类体裁的散文。九十卷本的《托尔斯泰全集》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各种散文作品,如政论、文学评论、特写、随笔、札记、书信和日记等等,其中有洋洋洒洒的宏篇巨作,也有短小精练的艺术佳品。

托尔斯泰走过了漫长的人生旅程,世界观和艺术风格有过不少变化。他出身于世袭贵族,但极其熟悉俄国乡村,熟悉地主和农民的生活。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加剧,俄国乡村一切“旧基础”的急剧破坏,加强了托尔斯泰对周围事物的注意,加强了他对这一切的兴趣,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转变。他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断绝了与贵族阶级传统观点的联系,成了千百万宗法农民思想情绪的表达者。他对沙俄的国家制度、贵族阶级、土地私有制和官办教会的否定,反映了广大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来期间的思想情绪。托尔斯泰这个时期创作的揭露批判力量空前加强,那种“撕下一切假面具”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达到发展的高峰。但是,世界观转变之后的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也更加尖锐。他在全面而深刻

地批判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同时,却否定一切暴力,进行抽象的道德说教。这种尖锐的思想矛盾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但是其中占主导的仍然是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民群众的深切同情和对统治阶级的愤怒抗议。本书所选的作品从不同方面探索解决十九世纪末俄国基本的社会问题的途径。列宁指出,托尔斯泰表现出“‘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的大无畏精神”。作家在现实生活中敏锐地观察一切,深刻地思考一切。为什么俄国人民大批地死亡?人民贫困的原因在哪里?为什么沙皇政府实行惨无人道的暴力?“他在自己晚期的作品里,对现代一切国家制度、教会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作了激烈的批判,而这些制度所赖以建立的基础,就是群众的被奴役和贫困,就是农民和一般小业主的破产,就是从上到下充满整个现代生活的暴力和伪善。”^①但是另一方面,他又竭力鼓吹“勿以暴力抗恶”和“道德自我完善”。

本书的选篇多数为托尔斯泰后期的作品,在体裁上,尽量兼顾多样,不仅选译了政论和文论,而且也收入了他晚年反映俄国农民生活疾苦的纪实性散文以及回忆录等。这些散文,除《当代的奴隶制度》和《回忆录》以外,一般来说篇幅都比较短小,论说文言简意赅,鞭辟入理,记人记事的散文则文笔朴质,简洁明快,各有其独特的思想艺术价值。从体裁上来说,本书所选的各篇可以归为四类:叙事散文(即所谓特写)、政论、文论和回忆录。

托尔斯泰晚年否定了文学创作中的艺术虚构,强调文学的纪实性,而且他的艺术风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更趋于纯朴和平易。他逝世前两年写的一组特写,或称“生活小场景”,即收入本书的《村中三日》等5篇,记述的都是实际发生的具体事实和现实细节,作者本人与农民的会见等等。其实,这种纪实性散文也是一种独具一格的艺术概括形式。作者作为所描写的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者,不仅真实地记述了具体的

①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和现代工人运动》,《列宁论文学艺术》第296页。

人和事,显示出巨大的揭露力量,而且作者本人也有可能直接抒写自己的感受和思考。托尔斯泰写作这些作品时力图“更加真实”,让读者觉得所写的一切并非虚构,阅读这些作品不是为了“消遣”,因此竭力排除一切艺术想象,在风格上力求朴实。

《村中三日》实际上是3篇各自独立的特写,但在主题上却是统一的——广大农民已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这3篇特写写于1909年末至1910年初,从作者当时的日记来看,描写的都是他的亲身经历或亲自目睹的事实,反映了时代的基本特点——“生活不能以这样的形式继续下去”,“结局已经临近”。

《和过路人的谈话》记述的是托尔斯泰1909年到切尔特科夫家做客时在克列申诺村和一个过路的农民的谈话。

《过客和农民》采用对话体,跟前一篇一样,是作者和当地农民的一次谈话,当时作了记录,后来稍加润色。

《乡村歌声》记述的是清田村农民欢送壮丁的“热闹”场面,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无限凄惨。

《沃土》讲述了作者1910年6月到切尔特科夫家做客时遇到的一个青年农民以及在他身上发现的巨大精神潜力。

1899年9月23日,托尔斯泰从莫斯科—喀山铁路上一位司秤员那里得知装卸工一连劳动36个小时的情况,大为震惊。他亲自到货场去调查,决定写一篇题为《从一件令人深思的事想起》的短评,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在写作过程中,他的构思不断扩充,从铁路装卸工的劳动状况写起,涉及到他对俄国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各种根本性问题的思考,终于写成一篇宏伟的社会论文——《当代的奴隶制度》。这是一篇纲领性的论著,全面地阐述了托尔斯泰的社会政治观点。《当代的奴隶制度》于1900年首次在伦敦的《自由言论》上发表,但俄国由于书刊审查机关的干涉直到1917年才全文问世。

1900年秋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席卷俄国各大城市,沙皇政府疯狂镇压,1901年1月11日下令把基辅大学183名学生充军,并对其

他各地的学生进行残酷迫害。3月中旬,托尔斯泰写了《致沙皇及其助手们》。这是一篇声讨沙皇反动政府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的檄文,在寄给尼古拉二世的同时还在国外公开发表,而在俄国国内则以各种形式广泛秘密流传。

托尔斯泰晚年在长篇小说《复活》等许多著作中对俄国官办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俄国圣主教公会于1901年2月21—22日作出把他革出教门的决定,并且于24日正式向全国公布。过了一个月之后,托尔斯泰于3月24日动手写《答主教公会2月21—22日的决定——兼复我就这一事件所收到的来信》,4月4日写完。这封公开信不仅继续揭露官办教会欺骗人民、麻痹群众的种种伎俩,一一批驳了圣主教公会对他的各种指责,而且简洁而全面地阐述了作者的宗教观点——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道主义思想。

托尔斯泰一生中除了《艺术论》等理论性很强的美学著作之外,还写了大量文学评论文章。本书所选的3篇文学论文写于不同时期,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文学观点的变化。

托尔斯泰于1852年登上俄国文坛,自传三部曲《童年》、《幼年》和《少年》(1852—1856)以及反映克里米亚战争的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4—1855)等问世后,给他带来广泛的声誉。1859年1月28日,托尔斯泰经康·谢·阿克萨科夫推荐,被吸收为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会员,2月4日在该会集会上发表演说。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曾迷恋于“纯艺术”论,他的中篇小说《阿尔贝特》(1857—1858)和《家庭的幸福》(1859)对此有所反映。《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讲话》则直接表述了作者的这种艺术观点。

随着世界观的转变,托尔斯泰的艺术观点也发生很大变化。他早年就曾从事农民子弟的教育工作,70年代初为农民编写了《识字课本》。1888年,托尔斯泰与“中间人”出版社合作,准备编辑出版一套大众读物,并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发表《关于出版大众图书的讲话》,对文学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要面向广大群众,而且首先要向民众学习,才

能为人民提供真正富有营养的东西。这反映了他世界观转变以后艺术观点的深刻变化。

1905年,托尔斯泰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1899)收进他为广大群众所编的《阅读园地》,并且专门为之撰写了序言。这篇序言分析了艺术创作中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互矛盾的特殊现象,但也流露出托尔斯泰在妇女解放问题上的褊狭。

托尔斯泰晚年曾经多次产生过写一部自传性作品的构思:“完全如实地写自己”。本书介绍的《回忆录》就是他应其传记作者帕·伊·比留科夫之约而写的一部自传,1902年12月开始写作,但时断时续,至1906年底未完而辍笔。已写成的部分虽然只涉及了托尔斯泰童年时期的生活,但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与他早期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并无重复。作者经历巨大思想变化之后,回过头来以新的人生见解来审视自己的漫长一生,对当年周围的人和事,对自己的所做所为,自然都有了新的认识。童年是他一生中最纯洁,最美好的时期,他觉得人与人之间充满了爱,因此无论是自己的亲人,还是家里的仆人和来访的亲友,全都是相亲相爱的。《回忆录》中对儿童生活这种富于诗情画意的描写自然也透露出一位老人行将告别人世时对自己童年生活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怀念以及对人生和对人世的无限热爱。同时,我们在这里也发现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名作中许多艺术形象的生活原型。

本书各篇皆按体裁编排,《回忆录》是未竟之作,附在最后。正文中的英、法、德等文字皆直接译成汉语,原文录在附注里,供读者参考。注释除特殊注明外皆为译者所加。

译者 1997年6月于哈尔滨

目 录

无情的揭发, 愤怒的抗议

——译者前言

村中三日	1
和过路人的谈话	22
过客和农民	25
乡村歌声	33
沃土(日记摘抄)	38
当代的奴隶制度	45
致沙皇及其助手们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呼吁书	102
答主教公会 2 月 20—22 日的决定	
——兼复我就这一事件所收到的来信	108
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的讲演	117
关于出版大众图书的讲话	120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宝贝儿》序	128
回忆录	132

村中三日

第一天 流浪的人们

如今农村兴起一种前所未见和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儿。我们的村子住着8户居民，每天都有6至12个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过路人来此投宿。

这些衣衫褴褛的人，几乎是衣不遮体，无袜无鞋，常常是身患疾病，肮脏不堪，走进村子，找到甲长。甲长为了不让这些人冻死和饿死在街头，把他们分派给本地居民。甲长只把农民看成是居民，因此不把这些入领到地主家去，尽管地主家除了十几间自己的居室，在账房、车夫室、洗衣坊、干粗活和细活的仆役室以及其它一些机构里还有数十间住房；也不把他们领到神庙或教堂执事、商人入去，尽管他们的住房虽不甚大，但毕竟还有一些空闲的地方，而是把他们领到农民家，尽管他们全家：妻子、儿媳、姑娘和大大小小的孩子，全都挤在一间七八俄尺，最多不过10俄尺的房间里。主人接待这个饥寒交迫、衣衫褴褛、肮脏不堪、气味难闻的人，不仅为他提供住宿之处，而且还给他饭吃。

“你自己坐下来吃饭，”一个年老的主人对我说，“不能不叫他过来吃。不然心里过不去，所以就让他吃，让他喝。”

这是夜间投宿；要是白天，每个农民家来的就不是两个三个，而是十个或者更多这样的来访者。那时候也还是：“不能不……”

婆娘，尽管她家的面包也远远吃不到新粮，可还是给每人切一块，大小视人体胖瘦而定。

“如果每人都给，圆面包就不够一天吃的了，”女主人对我说。“有时就得作孽，拒绝给。”

这种事在整个俄国天天都在发生。乞丐、残疾人、流放犯、孤苦伶仃的老人，以及主要的，失业工人的大军，数量年年增加，他们的住处，也就是躲避严寒和雨雪的处所，以及饮食，直接靠着农民——劳动最重和最贫困的农村阶层的援助。

我们有贫民收容院和习艺所，有社会救济的法令，每个城市里都有各种慈善机关。所有这些机关，室内有电气照明、木质地板、整洁的服务人员和领取高薪的办事人员，成千上万各类孤苦伶仃的人在这里得到救济。可是不管这种人如何多，与那个庞大的居民（数目不详，但应该是庞大的）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他们如今在俄国四处流浪，沿途乞讨，得不到任何机关的救济，吃住全靠农村里的农民提供，他们只凭着自己的基督教感情来承担这项巨大而沉重的义务。

不妨设想一下，那些过着非农民生活的人，假如每周哪怕有一天给他们的卧室安排一个饥寒交迫、肮脏不堪和满身虱子的过路人住宿，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而农民不但收留这些过路人住宿，而且供给他们茶饭，是因为“如果不让他们和自己一起坐下来吃饭，心里过不去”。（在萨拉托夫、坦波夫和其它省份的偏僻地方，农民不等甲长把过路人领来，而总是主动接待这些人，给他们提供饮食。）

像做一切真正的善事一样，农民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注意到这是善事。然而，这种事的确是善事，除了“为了心灵”之外，对于整个俄国社会来说也是一桩具有重大意义的举动。这种事情对于俄国社会来说的重大意义在于：假如没有农民，他们没有基督教的感情（他们身上这种感情是非常强烈的），就很难想象

这成千上万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不幸的人会处于何种状态，而且不仅仅是他们，还有那些富裕的，特别是那些安居乐业的富有的乡村居民又会是处于何种状态。

只要是看一看这些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人贫困和苦难的程度，只要想一想他们所处的精神状态，就足以理解，唯有农民所给予他们的援助才解除了他们对富人施加的暴力，因为富人掌握着大量他们为活命而必需的东西，这些不幸的人要是对他们施加暴力，那么处于他们那种状况也是很自然的。

因此，不是慈善团体，也不是政府及其警察和各种司法机关保护了我们这些富有阶级的人们，免除了这些穷得不能再穷和完全绝望的饥寒交迫、无家可归、四处流浪的人对我们的袭击，而是农民保护了我们，就像俄国人民生活的这种基本力量养活我们一样。

是的，假如在农村广大居民中间没有那种人人相亲相爱的深刻宗教意识，尽管有警察（他们在乡村是很少的，而且也不可能多），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已经绝望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早就把所有富人的房子荡平，而且会杀死他们路上遇到的一切人。因此，我们听说或读到有关抢劫或者以抢劫为目的的凶杀消息时，就不要大惊小怪，而应该懂得和牢记，既然很少发生这种事情，那么我们只能感激农民给予这些不幸的流浪者的无私援助。

我们家每天都来 10 至 15 个人。这些人中间有真正的乞丐，他们不知何故选择了这种活命的方式，给自己缝个口袋，尽可能地穿得破烂不堪，就四处流浪起来。这些人中间有盲人、缺胳膊少腿的，也有儿童和妇女，虽然很少见。但这种人是少量的。如令大部分乞食者——这是过路的乞讨者，他们不背着口袋，大部分是年轻人，而不是残疾人。他们的样子都非常可怜，脚上没有鞋，衣不遮体，骨瘦如柴，冻得瑟瑟发抖。你问：“到哪儿去？”回答几乎总是一样的：“找活儿干”，或者：“找过活儿。但

没能找到，现在回家。没有活儿，到处都停业。”这些人中间也有不少是从流放地回来的。

在这大量乞讨的过路人中间，有许多具有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有人明显酗酒，是酒使他们落到这个地步，有文盲，也有非常有知识的，有纯朴、羞怯的，也有相反的，死气白赖，让人讨厌的。

前两天，我刚刚睡醒，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对我说：

“门前有5个过路的。”

“在桌子上拿，”我说。

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拿了钱，按规矩每人施给5个戈比。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出去，走到台阶上。一个身材矮小的人，穿得异常破烂，鞋完全绽开了，脸上有一种病态，眼皮肿胀，眼珠转来转去，他开始向我鞠躬，递过一张证明。

“给你了吗？”

“大老爷，5个戈比够干什么呢？大老爷，请您设身处地为我想想，”递过证明。“请您看看，大老爷，请您看看，”他指着自己的衣服。“我能到哪儿去，大老爷（张口不离“大老爷”这个词儿，可是脸上流露出的却是憎恨的神色），我怎么办哪，我到哪儿去呀？”

我说，施给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数目。他继续祈求，要我读证明。我拒绝了。他下起跪来。我要求他离开我。

“怎么，就是说，我得自杀吗？只剩下这一条路了。再没别的办法了。哪怕随便给点儿呢。”

我给了20个戈比，他走了，显然是很怨恨。

这种特别能纠缠的人特别多，显然是认为有权向富人索回自己的那一份。这大部分是些有文化的人，甚至往往读过很多的书，没有白白地经历了革命。这种人不像那些自古就有的通常的乞丐，认为富人的施舍可以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是把富人看成强盗，看成吸劳动人民血的窃贼；这种乞丐往往不劳动并且竭

力逃避劳动，却认为自己不仅有权代表劳动人民，而且有义务憎恨人民的掠夺者，即富人，自己越贫困就越是憎恨他们，他们本来想向富人索取，但只是装作乞讨的样子。

这种人很多，还有酗酒者也很多，关于他们我想要说，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但在流浪的人群中也有不少人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他们温顺、老实而且非常可怜，正是一想到这些人的处境，就不寒而栗。

有一个身材高大、相貌好看的人，只穿一件破烂的短上衣，皮鞋已穿破，脸上露出聪明的神色。他像通常那样，乞讨时摘下帽子。我施舍了，他表示感谢。我问：从哪来？到哪去？

“从彼得堡来，回乡下去（我们同省）。”

我问：为什么这样，徒步行走？

“说来话长，”他说，耸了耸肩膀。

我要他讲讲。他讲的显然是真实的，他说他“住在彼得堡，当办事员，职务不错，薪水 30 卢布”。日子过得很好。“读过您的书：《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他说，又笑了，笑得特别可爱。

“家人想要移居西伯利亚，”他继续讲道，“搬到托木斯克省去。”写信问他是否同意卖掉他在故乡的那部分土地。他同意了。家人走了，但是他们在西伯利亚得到的土地很糟，在那里把钱花光，又回了家。现在在村里租房子住，没有土地，只好给人干活糊口。这时，他在彼得堡的生活也搞糟了。首先是他失掉了职位，不是自己丢的，而是他工作的那个公司破产了，职员全部解雇。“这时，说句真话，我跟一个女裁缝搞在一起了，”他又笑了，“她把我洗劫一空。从前我帮助过家人，可是现在却成了这样一个‘太款’。上帝不会不发慈悲，也许我能站起来。”

显而易见，这是个聪明而有力量的人，有进取精神，只是一系列偶然因素才使他陷入目前的处境。

另外还有一个人：脚上穿着一双破旧不堪的鞋，腰里扎着一条绳子。衣服从上到下满是窟窿，显然不是挂的，而是穿得不能再破了，他的脸上颧骨突出，但模样受看，聪明而冷静。像通常那样，我给了他5个戈比，他表示感谢。我们攀谈起来。他是个流放犯，住在维亚特卡。那里过去就不好，如今更糟，他现在到他以前住过的梁赞去。我问道：干什么的？

“送报的。”

“因为什么而蒙受苦难？”

“因为传播非法出版物。”

我们谈论起革命来。我说了自己的意见，认为一切都在我们自己，这种巨大的暴力不可能用暴力摧毁。

“首先要消灭我们自身的邪恶，只有那时我们身外的邪恶才能消灭，”我说。

“倒也是这样，可是不会很快。”

“这取决于我们。”

“我读过您的关于革命的书。”

“这不是我的，但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要您几本书。”

“我很高兴。但愿不给您带来危害。我给您几本最无害的。”

“我怕什么？我已经什么都不怕了。对我来说，监狱也比现在这样好。我不怕坐牢。有时倒是希望坐牢，”他阴郁地说。

“多么可惜，这么多的力量白白地浪费掉了，”我说，“像您这样的人，在毁坏自己的生活。您现在怎么样？打算怎么办？”

“我吗？”他说，盯着我的脸。

当话题涉及到过去和一般性问题时，他回答得很爽快，而且理直气壮，可是一涉及到他本人以及当他看出我的同情时，他就转过身去，用袖子盖上眼睛，他的后脑勺颤抖起来。